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 周作人散文世界的“真实”

科目编号：UASZ3063

学生姓名：丘妮艳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金进 老师

呈交日期：2011 年 4 月 15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目次

题目	.....	i
宣誓	.....	ii
摘要	.....	iii
致谢	.....	v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5
	第二节 前人研究	7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9
	第四节 研究难题	10
第二章	周作人散文中所体现的“真实”	12
	第一节 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怀	12
	第二节 出于真诚的自我直视	18
	第三节 出于人生味的缺乏	25
第三章	周作人散文对“真实”追求的背后	39
	第一节 知识背景的启发	40
	第二节 人生经历的影响	49
结语	.....	60
参考书目	.....	62

# 周作人散文世界的“真实”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8AAB03673

日期：05-04-2011

## 摘要

本论文的探究方向主要是探讨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基本原则，也即是表现“真实”的散文创作观。透过结合散文文体特征与他笔下的小品散文创作，从而探讨其在文本中所体现的对“真实”创作原则的追求与形成，并尝试诠释这种追求对于潜藏在其心里的对于其自身的象征意义，以及对其书写产生了什么样的艺术效果。作家往往都有个不可不书写的命题，而这个命题永远都是作者自身的最深刻经历抑或是最向往的彼岸。对周作人而言，他的创作命题无疑是其终身提倡的“人的文学”为中心的对“人”存在本质的思考。从他所接受的知识 and 所经历的人生，无一不启发和影响他对“人”存在本质的思考，促使他在文学创作里激烈地抨击中国文学中所存在着大量“非人的文学”。这种对人，对自身，以及对民族未来的寻问与关怀，对周作人自身，以及其散文创作观无疑是具有相当层度的影响的。论文将分作三章进行探讨，最后作一个总结。前言将首先针对“人”存在本质的创作命题和“真实”的定义，接着将主要论述研究目的、前人研究、研究范围与方法，以及研究难题，务求有条理地刻画出本论文的总休轮廓，及整理出明确的研究方向。

第二章将会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尝试透过分析周作人不同类型散文中所体现的“真实”，归纳出周作人是如何在其小品散文创作中表现出其对“真实”的追求。作家的书写往往都是有所追寻的，这意图在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创作里，是非常清楚且明显的。基于此，此章将会通过周作人不同类型的小品散文创作，深入地探讨周作人是出于一个怎样的心理状况下进行小品散文创作

的，并尝试从中窥探周作人潜藏在文本中对人、自身与民族未来的期盼与向往。同时，也试图从中印证贯穿周作人小品散文创作的命题，即以“人的文学”为中心的对“人”存在本质的思考，以求对周作人小品散文的整体把握。此外，此章也会从周作人不同类型的小品散文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语言与艺术特征来印证与加强对周作人的创作心理的分析与归纳。

第三章主要是通过传记考察的方式，尝试透过对周作人生平的探究归纳出其散文对“真实”创作原则的追求的来源。人生活于社会，其思想与人的现实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周作人对于“人”存在本质的思考乃是出于其对“人”的真理的重新发现，而此真理的发现乃是源自于其所接受的知识的启发，以及其人生经历的影响。因此，此章将会尝试归纳出周作人是如何从其相关的知识背景与生活经历里得到对“人”的重新发现，以及对其创作观产生了怎样的启发与影响进行探讨。对周作人知识背景的考察，主要是侧重在理论上，周作人所得到的“人”的重新发现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上的启发；而对周作人人生经历的考察主要是侧重在现实中，周作人所得到的“人”的重新发现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的影响。

结语主要是为前三章的分析论述作出整体总结。主要交代的是周作人散文对“真实”追求对于潜藏在其心里的对于其自身的象征意义，并对此意义作出客观的评语。

关键词：散文、真实、人的文学、象征意义

## 致谢

终于做完了。松了一口气之余，竟有些许不舍。

论文是一次很好的自我评估。做论文仿佛是一次远赴他乡的打工旅行。旅途是一次自我探索的过程。在这艰辛且漫长的旅途中，你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国度里探索。一路走来，你战战兢兢，忧心忡忡，却也不乏希望与惊喜。或许你会在途中迷失自我，以至陷入困境，然而，同行的旅人一句有力的“加油”会让你立即振奋起来。然后继续往前，寂寞的旅程便再也不寂寞。或许你会想念远在故乡的亲人，在某个寂寞的夜悄悄地滴下眼泪。然而，你会赶紧将滑落脸颊的泪水擦干，然后愈发坚定地告诉自己：我不哭。你倔强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一份如此珍贵、经过多少磨练才得以换来的坚毅。因为，你知道：家，若想要回去，就有能回去的时候，只因家人会永远守在那儿，摊开双手欢迎你回来。但是，你现在不能回去。你现在要做的是找到你自己。然后，很庆幸的，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你终于找到你自己。于是，归还。

谢谢一路上对我喊过加油的人。谢谢金进老师，我泄气了他为我打气，我迷惑了他一句有力的加油让我重拾信心，我任性时他毫不吝啬地给予包容，谢谢他让我再次提起勇气往前冲。谢谢建豪，我迷途了他细心地为我指点，我烦恼时他耐心地听我倾诉。谢谢婉仪、美玲、悦诗，还有师傅，谢谢他们对我的理解，谢谢他们对我的关怀。谢谢我亲爱的室友们，谢谢他们为我打气，谢谢

他们的帮助。当然，还要谢谢我的家人，谢谢他们的理解与关怀，尤其是我那亲爱的母亲，这段日子有劳她为我操心了。此外，还要谢谢让我又爱又恨的周作人，谢谢他让我懂得一个道理：重要的不是你是个怎样的人，而是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谢谢他让我找到我自己。最后，我要谢谢我自己。谢谢自己曾经真心努力付出过。谢谢自己对周作人还有自己的坚持。谢谢自己的不轻易言败。

论文是中文系三年来来的一个总结，是给自己一个交代。这句号一定要画得完整圈得美，以便在往日回首时，还有一个值得怀念的、曾经真心努力付出所换取的成果。它是我大学最好的凭据，也是我这一阶段的价值所在。我会想念写论文的这些日子。这些日子连同我的青春都回不去了。现在唯有跟论文道别了。再见了论文。再见了大家。再见了我的大学我的青春。

生命是一次寻找自己的旅程。生命之旅是永远也不会终止的。我得继续去找寻生命中的另一个发亮点了。

最后，再一次谢谢所有对我喊过加油的人。谢谢我的生命中曾经有你。谢谢。

## 第一章 前言

周作人是中国“五四”新文学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其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sup>1</sup>而“人的文学”很快就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sup>2</sup>，同时也成为贯穿其白话文，尤其是散文（或称小品散文、小品文、随笔等）创作的主要命题。

“人的文学”的提出是基于“人”的真理重新发见所提倡的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其所强调的是人作为从动物进化的生物，即灵与肉一致的人的一切生活本能是美的善的，且拥有健全的理性以及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应得完全的满足。因此，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阻碍人性向上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简而言之，“人的文学”就是要先肯定自己，懂得爱自己，进而爱人类。<sup>3</sup>

《人的文学》发表之后，周作人在“五四”文学期间，陆续发表了《平民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评论文章，从新的发现中不断地更进其思想与文学主张，与时俱进地致力于深入思考“人”的存在本质，同时也在不断的探索中有意无意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位子。因此，对于“人”的思考成为了其看世界的准绳。然而，其身处一个复杂多变、新旧文化交替与中西文明冲击的中

---

<sup>1</sup>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17。

<sup>2</sup> 胡适称赞《人的文学》是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详见赵家璧主编；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台北市，业强出版社，1990，页1。

<sup>3</sup> 详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8-17。

国革命时代，深深感染那股革命热潮之余，同时作为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兼时代的弄潮儿，其也面临着极大的彷徨与疑惑。笔者发现，这种对于民族与自身未来的寻问与关怀，表现在其创作实践（小品散文或小品文）时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一种在现实的逃离中对自我定位与自我回归的渴望与向往。

周作人小品散文艺术造诣之高，并非三言两语就能将其概括的。周作人自1924年开始小品文创作，从此其名字便与“小品文”一词分不开。杨牧在论周作人散文时，赞其是“近代中国散文艺术最伟大的塑造者之一，他继承古典传统的精华，吸收外国文化的精髓，兼容並包，体验现实，以文言的雅约以及外语的新奇，和白话语体相结合，创造生动有效的新字汇和新语法，重视文理的结构，文气的均匀，和文彩的彬蔚，为二十世纪的新散文刻画出再生的风貌。”<sup>4</sup>不但如此，杨牧还准确地指出周作人小品散文的价值：“周作人之塑造近代散文，初不仅止于他的文字风格和章法结构，更见于他对健康的题材之追求与开发，剑及履及，证明现代文字的无限功能。”<sup>5</sup>而近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在品读周作人的小品文《苍蝇》时如此说：“如今天下文人学者都在那儿著书或整理演讲集，谁有心思去理会苍蝇搓手搓脚！然而在读过装模作样的新诗或形容词堆砌成的小说（应该说“创作”）以后，让我们同周先生坐在一块，一口一口的啜着清茗，看着院子里虾蟆戏水，听他谈“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二十年前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清波门外的杨三

---

<sup>4</sup> 周作人著；杨牧编：〈周作人论〉，《周作人文选·代序》（初版），台北市：洪范书店，1983，页1。

<sup>5</sup> 引文中所指的“健康题材”乃是以“人的文学”此命题为本的文学信仰。详见周作人著；杨牧编：〈周作人论〉，《周作人文选·代序》（初版），页2-3。

姑一类故事，却是一大解脱。”<sup>6</sup>周作人通过一颗真诚与宽厚的心去理性地、细细地体味各种文化的精髓与凡俗人生的方方面面，并把从中寻获的发见与体悟写进文章里，企图借助手中的笔与读者一同去感受，去体会其所追求的真实。

本文指的“真实”即不等同与生活真实又有别于科学真实，而是艺术真实。所谓的艺术真实，是指艺术家在生活的基础上，对生活真实进行提炼、加工、集中、虚构和艺术概括而创造出来的表现社会生活某些本质和规律的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sup>7</sup>这里所强调的艺术特征：“基于现实生活”指的是艺术真实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生活真实的升华；“艺术处理与艺术概括”指的是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发掘、提炼、补充、集中、概括，并建立在符合事理或情感逻辑，以及能为读者所接受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虚构予以重组、变形和再塑社会生活本质方面的真实缩影；“表现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与规律”指的是艺术家以“历史理性”<sup>8</sup>的眼光，透过生活真实的表层对社会生活的内涵作出艺术的揭示和表现。此外，由于作家站在人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感受，以及对社会人生关注的立场上看待客观世界的，因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验和感悟必然带有浓厚强烈的主观性，而文学就是以这样主观性的“真实”，在作品中建构其从属于人的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从而帮助人们加深对自身的认识、体验并激起关注社会人生的积极感情，以履行不同于科学活动而属于文

---

<sup>6</sup> 朱光潜：〈雨天的书〉，《朱光潜全集》（第八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页191。

<sup>7</sup> 余三定主编：《文学概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106。

<sup>8</sup> 作家的“历史理性”并非只是体现在描写较为重大的社会事件的文学创造上，不同的题材选择和不同的表现侧面及方式，同样能够让作家的认识和感悟走向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如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虽然关注的都是凡人琐事，可是他笔下那些仿佛是从生活中随手拈来的故事，无一不是俄国专制制度下社会生活的残暴性、自私性即保守性等本质特征的真实写照。参见重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页157。

学自己的审美价值追求职责。<sup>9</sup>有如周作人所强调，“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sup>10</sup>，“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sup>11</sup>，“不承认权威，疾虚妄，重情理”<sup>12</sup>等等。周作人正是在其小品散文创作中无不表现出他对社会生活的真实体悟。

本文最主要是通过文本细读与传记考察，试图结合散文文体的特征与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创作来探讨其在文本中所体现的对“真实”创作原则的追求与形成，并尝试诠释这种追求对于潜藏在其心里的对于其自身的象征意义，以及对其书写了产生了怎么样的艺术效果。

---

<sup>9</sup> 参阅重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2版），页159-160。

<sup>1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谈文章〉，《知堂乙酉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113。

<sup>1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本色〉，《风雨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29。

<sup>1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页58。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之所以对周作人研究大感兴趣，主要源自于笔者在中文系第二年第二学期由金进老师所授教的现代思想史课程里的研讨课题目——《周作人人生道路的选择》。当时，笔者因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有所思考而选择了以此题目作为学期报告，企图从中得到观照，从而也开始了对于周作人的认识。为收集此报告的资料，笔者来到了《周作人自编文集》面前。面对庞大的书堆，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周作人的《雨天的书》。经过一翻阅览，笔者不禁为其散文里头对于凡俗人世中人类生活“真实”的描写所赞叹，那是多么美丽且真诚的文字情感啊。于是，懊恼——如此优秀的一位作家为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被重视？在此之前，笔者只知道鲁迅的伟大，却对其弟弟——周作人一无所知。更让笔者困惑的是，周作人原是汉奸！这种身份与其文字所流露出来的“真实”有着极大的出入。然而，笔者认为，无论事实的真相为何，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周作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于是，周作人这个复杂而又有趣的人物，连同其散文创作，就成了笔者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

周作人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及散文家，其最突出的贡献，是以“人的文学”来概括新文学的内容，标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sup>13</sup>而“人的文学”很快就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sup>14</sup>，同时也成为贯穿其白话文，尤其是散文（或称小品散文、小品文、随

---

<sup>13</sup>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 17。

<sup>14</sup> 胡适称赞《人的文学》是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作‘人的文

笔等)创作的主要命题。然而,目前对于周作人散文的研究不是专注于对周作人文艺观源流的研究,就是单方面地分析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缺乏双方面的互相观照与印证,还有书写命题的配合,以及理论与历史背景的观照,导致研究缺乏整体的把握与归纳。笔者认为,散文研究除了得融合文艺观与散文艺术,创作精神的探究和其潜藏的象征意义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了解一位作者的知识背景与人生经历,更有助于提高解读其作品的的能力。因此,笔者尝试以周作人“人的文学”为中心的创作命题,来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进行有条理的分析,从中归纳出周作人是如何在其小品散文创作中表现出其对“真实”的追求,再加以周作人知识背景与人生经历的配合,以求对周作人散文创作观一个整体的把握,并希望从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原则的秉持中,发掘潜藏在其散文创作中的精神追求与对其自身的象征意义,再从周作人对散文的追求中获取其赋予我们的意义。

---

学’”。详见赵家璧主编;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台北市,业强出版社,1990,页1。

## 第二节 前人研究

周作人作为提倡与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白话文（尤其是散文）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外加他极富戏剧性的一生，一再吸引着他的同代人和后人们的眼光，使他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人物。对周作人的研究已有 80 年历史：解放前 30 年为开始阶段，建国后 30 年为沉滞期，新时期以来的 20 多年是周作人研究的全面展开时期。<sup>15</sup>新时期周作人研究则主要围绕着周氏的人生道路和思想演变、文艺思想和文化观念、散文小品的审美和艺术等几个论域展开。本论文主要是专注在周作人文艺观的研究和散文艺术的分析两个方面。

在周作人文艺观的研究方面：钱理群的《鲁迅、周作人文学观发展道路比较研究》<sup>16</sup>在与鲁迅的比较中突出周作人人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在动态发展中考察了周作人文学观的衍变线索。罗钢的《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sup>17</sup>探讨了周作人“人的文学”思想的西方理论原型。沈卫威的《周作人的新文学探源之路》<sup>18</sup>则重点阐述了周作人文艺思想与传统文学资源的关系。论述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sup>19</sup>等。

在周作人散文艺术的分析方面：许志英的《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sup>20</sup>是新时期较早进入这一论题的文章，它认为知识性、幽默性、诗性是周作人散文的

---

<sup>15</sup> 温儒敏、李宪喻、贺桂梅、姜涛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 381。

<sup>16</sup> 载《中国社会学科》1984 年第 4 期。

<sup>17</sup>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 年第四期。

<sup>18</sup> 载《中州学刊》1995 年第 2 期。

<sup>19</sup> 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sup>20</sup> 载《文学评论》1981 年第 6 期。

艺术特征。对周作人散文艺术的阐释水准到了 80 年代后期有所提高：舒芜的《周作人的散文艺术》<sup>21</sup>辩证地揭示了周作人散文艺术风格的兼容性，周作人散文有正经和闲适两大类，它们不存在分明的界限，不少闲适文章里寄寓着正经的思想，并非一味平和闲适；而不少正经文章内容严肃，风格却力求平和冲淡。钱理群的《周作人的散文艺术》<sup>22</sup>系统地探讨了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与特定的时代氛围、社会心理，与他本人的生活方式、个性气质、思维方式、审美取向的内在契合性。黄开发的专著《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sup>23</sup>的突破体现在它揭示了周作人作为思想家和作为文体家的统一性。该书在第 5 章《小品散文文体》集中讨论周作人散文艺术，并指出周作人的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是在平淡与不能平淡、正经与闲适之间保持艺术的张力，其根本法则就是节制，并因此而形成周作人散文特有的“苦”味。此外，作者还从作家的生活方式、主观心境与语体的统一中勾勒了周作人散文的问题发展史。

纵观所罗列的论文与论著，大部分的研究不是专注于对周作人文艺观源流的研究，就是单方面地分析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缺乏双方面的互相观照与印证，还有书写命题的配合，以及理论与历史背景的观照，导致研究缺乏整体的把握与归纳。

---

<sup>21</sup> 载《文艺研究》1988 年第 4-5 期。

<sup>22</sup> 钱理群：〈周作人的散文艺术〉，《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 91-106。

<sup>23</sup> 黄开发：〈小品散文文体〉，《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 101-148。

###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论文的研究范畴首要是从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创作分析中探讨周作人散文创作观，其次是从周作人历史背景中考察对其小品散文创作观的启发与影响，再者是从对他人对周作人的小品散文的评论中加强和印证对周作人小品散文创作观的论述。此外，还须给予文学理论上的辅助。

周作人小品散文创作方面，将会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止庵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37本为主，其中包括《欧洲文学史》、《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艺术与生活》、《儿童文学小论》、《看云集》、《知堂文集》、《周作人书信》、《苦雨斋序跋文》、《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味集》、《药堂杂文》、《书房一角》、《秉烛后谈》、《苦口甘口》、《立春以前》、《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过去的工作》、《知堂乙酉文编》、《知堂回想录》（上）、《知堂回想录》（下）、《木片集》和《老虎桥杂诗》；周作人的历史背景方面，则主要参考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止庵的《周作人传》，以及周作人的自传《知堂回想录》；文学理论方面，尤其是“真实”的定义与特征上，则主要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重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及南京大学出版社，余三定主编的《文学概论》；他人对周作人的小品散文的评论方面，则主要参考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黄开发的《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与文体》等相关的论著。

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尝试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分析周作人不同类型散文中所体现的“真实”，大胆地揣测以至印证周作人是出于一个怎样的心理状况下进行小品散文创作的，并尝试从中窥探周作人真实的内心想法。此外，也会从周作人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语言与艺术特征来印证与加强对周作人的创作心理的分析与归纳。另一方面，论文也会通过传记考察的方式，尝试透过对周作人相关知识背景与生活经历的探究归纳出其散文对“真实”创作原则追求的来源与催化来印证周作人的创作心理。另外，也会设当地铺以适合的文学理论与相关的文学评论作为参照，以加强辩证的效果。

#### 第四节 研究难题

周作人散文创作观的研究是个非常吸引人的题目，然而却又让人不禁却步，只因周作人本身，及其历史背景太过于复杂，所涉及的范围太过于广泛，要做到全面的理解与把握是非常人能胜任的。因此，周作人研究难以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与缺陷。

为更能理解周作人的散文创作观的源流，对周作人所处的时代须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作者的创作总是离不开时代因素的影响。然而，周作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多变、新旧文化交替、中西文明冲击的中国革命时代。各种思想、主义相互撞击、渗透。要把握时代的氛围与理解当中历史事件的本质、前因后果是极为不易的。而周作人本身，处在一个如此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时代，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也颇为复

杂。至今，对于其人生道路的选择与生平事件的研究还是未能梳理出一条清晰且合理的脉络，也即是说对于周作人的人生依旧存在着许多还未解开的谜题。这对从事周作人研究的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点。因为，若不能把握周作人的处事原则与精神面貌，研究者就很难站定立场以对周作人作出合理、准确的评价。历来在学术上对周作人褒贬不一，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同情之理解”与尊重事实、尊重传统道义的张力关系中取得平衡，确实是每位学者都需直面的难题。

其次，周作人著作的知识范围涉及了哲学、宗教、神话、文艺和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生理学、心理学、性学等现代学科，还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各领域的学问。此外，周作人还是一个通晓日、德、英及希腊语的语言天才，要研究周作人文艺思想和创作观的外来文化资源，最好能直接去读相关文献的原文。但是，笔者的学力有限，知识累积单薄，且入世未深，视野狭隘，再加上文化涵养和文学素养上的不足已成为制约这方面研究深入发展的“瓶颈”。况且，周作人的文字看似平凡易懂，然而其中隐含的深意也不是人人都能体会的，尤其是后期的“文抄公”式的小品散文更是变得枯涩苍老，炉火纯青。这就无疑增加了解读周作人小品散文的难度。

再者，目前有关周作人的研究资料虽然不多，但基本资料还算齐全。然而，单是要消化“周作人自编文集”37本，及对其传记的考察对笔者而言经已十分吃力，更何况是把所消化的资料作有条理的归纳并将其有效地应用在研究中。这对笔者而言，无疑是个极大的挑战。然而，了解周作人散文创作观研究的难度，却使笔者更不轻易地忽略每一个可能的因素，对周作人研究更必须严谨以待。

## 第二章 周作人散文中所体现的“真实”

周作人 1924 年开始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创作，作为“散文艺术家”的周作人这是才真正的诞生。基于其小品散文对“真实”的追求，周作人在其小品散文创作中无不体现出其对社会生活的真实体悟与深刻揭示。然而，由于不同的作家因为其社会背景、个人气质、文化素养等不同，其对于社会生活的认知与体悟也有所差异。因此，本章将会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尝试归纳出周作人是如何在其不同类型的小品散文创作中表现出其对“真实”的追求，以及对其写作实践产生了怎么样的艺术效果进行探讨。

### 第一节 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怀

文字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周作人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因此，身为五四革命文学家的周作人，注意到单靠提倡白话文反对古文是不能根治中国人的荒谬思想的。于是他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如此说道：

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一体，不能分离……如今废去古文，将这表现荒谬思想的专用器具撤去，也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心里的思想，恐怕终于不能一时变过，将来老癭发时，仍旧胡说乱道的写

了出来，不过从前是用古文，此刻用了白话罢了。话虽容易懂了，思想却仍然荒谬，仍然有害……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改悔，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sup>24</sup>

因此，“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sup>25</sup>周作人因而以“历史理性”的眼光，透过文学革命的表层点出了文学革命的关键所在，也发现了文学革命所面对的根本问题。

在《祖先崇拜》一文里，周作人更是以科学理性的眼光深刻地揭示了“祖先崇拜”的流毒：

现在科学昌明，早知道世上无鬼，这骗人的祭献礼拜当然可以不做了。这宗风俗，令人废时光，废钱财，很是有损，而且因为接香烟吃羹饭的迷信，许多男人往往借口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说，买妾蓄婢，败坏人伦，实在是不合人道的坏事……我最讨厌许多人说，“我国开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么样”。开化的早，或古时有过一点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样崇拜，仿佛人的一身事业，除恭维我祖先之外，别无一事似的。譬如我们走路，目的是在前进。过去的这几步，原是我们前进的始基，但总不必站住了，回过头去，指点着说好，反误了前进的正事。因为再走几步，还有更好的正在前头呢！有了古

---

<sup>2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思想革命〉，《谈虎集》，页 7-9。

<sup>2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思想革命〉，《谈虎集》，页 9。

时的文化，才有现代的文化；有了祖先，才有我们。但倘如古时文化永远不变，祖先永远存在，那便不能有现在的文化和我们了。<sup>26</sup>

所以，“我们所感谢的，正因为古时文化来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够留下现在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将来也是来了又去，我们也是生了又死，能够留下比现时更好的文化和比我们更好的人”<sup>27</sup>周作人正是以一颗关怀民族未来发展的心，指出了“祖先崇拜”的专制性与盲目性，纠正了人们对于“祖先崇拜”的错误观念。

又如《麻醉礼赞》里的社会批判。文章首先说明麻醉是“人类所独有的文明”。斑鸠食桑葚则醉，猫食薄荷则醉，但这都是“偶然的事”，而“成心”去寻找麻醉，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一种“特色”，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异于禽兽的原因。接下来，文章介绍麻醉的种种方法：一为中国最普通的一种——抽大烟：

中国人的抽大烟则是平民化的，并不为某一阶级所享用，大家一样地吱吱的抽吸，共享麻醉的洪福，是一件值得称扬的事……我曾见一位烟户，穷得可以，真不愧为鹑衣百结，但头戴一顶瓜皮帽，前面顶边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去的，于此即可想见其陶醉之状态了……<sup>28</sup>

还有“中国古已有之的国粹的麻醉法——饮酒”，以及“信仰与梦，恋爱与死”，都是上好的麻醉。这里，周作人用“别扭的写法”来关注社会问题，含蓄幽默的笔调中蕴涵着对人性的痴迷、自我欺骗、麻木的讽刺，蕴涵着对民族“平民化”、“古已有之”、“上好的”国民劣根性的无奈，以及“凡人的悲哀”之悲叹。

---

<sup>2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祖先崇拜〉，《谈虎集》，页 4-6。

<sup>2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祖先崇拜〉，《谈虎集》，页 6。

<sup>2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麻醉礼赞〉，《看云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 10。

再者，有如《草木虫鱼》系列之一《金鱼》中的文化批判：

说到金鱼，我其实是很不喜欢金鱼的，在豢养的小动物里边，我所不喜欢的，依着不喜欢的程度，其名次是叭儿狗，金鱼，鸚鵡。鸚鵡身上穿着大红大绿，满口怪声，很有野蛮气，叭儿狗的身体固然太小，还比不上一只猫，（小学教科书上却还在说，猫比狗小，狗比猫大！）而鼻子尤其耸得难过。我平常不大喜欢耸鼻子的人，虽然那是人为的，暂时的，把鼻子耸动，并没有永久的将它缩作一堆。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种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这种嘴脸只好放到影戏里去……然而金鱼恰好兼有叭儿狗与鸚鵡二者的特点，他只是不用长绳子牵了在贵妇人的裙边跑，所以减等发落，不然这第一名恐怕准定是它了。<sup>29</sup>

周作人巧妙地将动物们比作人，从而说出他看人的标准：他不喜欢像鸚鵡的人，觉得它“满口怪声，很有野蛮气”。他也不喜欢像叭儿狗般“耸鼻子”的人。这并不是说人的脸上不可没有表情，他要的是“自然”——“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种感情”，而不是有如“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要咬人的样子”的叭儿狗般的做作。他认为“这种嘴脸只好放到影戏里去。而他之所以讨厌金鱼，就是因为它兼具了鸚鵡和叭儿狗的“特点”。他之所以不把金鱼排放在他不喜欢的动物

---

<sup>2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金鱼》，《看云集》，页17。

排行榜的第一，乃是因为它不像排行第一的叭儿狗般“用长绳子牵了在贵妇人的裙边跑”。这里，周作人通过对金鱼描绘，巧妙地提出了有力的批评。

此外，周作人还透过金鱼，联想到中国新嫁娘的小脚，从而指出国民的劣根性：

我每见金鱼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总会联想到中国的新嫁娘，身穿红布袄裤，扎着裤脚，拐着一对小脚伶俜地走路。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毛病，最怕看真的，或是类似的小脚。十年前曾写过一篇小文曰《天足》，起头第一句云：“我最喜欢看见女人的天足，”曾蒙友人某君所赏识，因为他也是反对“务必脚小”的人。我倒并不是怕做野蛮，现在的世界正如美国洛威教授的一本书名，谁都有“我们是文明么”的疑问，何况我们这道统国，刚呀割呀都是常事，无论个人怎么努力，这个野蛮的头衔休想去掉，实在凡是稍有自知之明，不是夸大狂的人，恐怕也就不大有想去掉的这种野心与妄想。小脚女人所引起的另一种感想乃是残废，这是极不愉快的事，正如驼背或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瘤，假如这是天然的，我们不能说是嫌恶，但总之至少不喜欢看总是确实的了。有谁会赏鉴驼背或大瘤呢？金鱼突出眼睛，便是这一类的现象。另外有叫绯鲤的，大约是它的表兄弟罢，一样的穿着大红棉袄，只是不开衩，眼睛也是平平地装在脑袋瓜儿里边，并不比平常的鱼更为鼓出，因此可见金鱼的眼睛是一种残疾……照中国人喜欢小脚的常例推去，金鱼之爱可以说宜乎众矣，但在不佞实在是两者都不敢爱，我所爱的还只是平常的鱼而已。

30

---

<sup>3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金鱼》，《看云集》，页18。

出于对中国妇女的同情，周作人“最怕看真的，或是类似的小脚”，认为这是不自然的，像金鱼突出的眼睛般，是一种“残疾”。然而，这却是“中国人”所喜欢的。他因此不禁发出“我们是文明么”的疑问。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也深感无奈，因为“我们这是道统国，刚呀割呀都是常事，无论个人怎么努力，这个野蛮的头衔休想去掉，实在凡是稍有自知之明，不是夸大狂的人，恐怕也就不大有想去掉的这种野心与妄想”。他之所以不喜欢金鱼，乃是因为他讨厌像金鱼般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中国的礼教束缚。他所喜爱的还“只是平常的鱼而已”，即自然又自由自在。

通过这几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周作人以其清醒理智的眼光，看到了民族的劣根性，然而，出于对民族命运与未来的关怀，其尝试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在文章里提出批判，企图打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还民族与自身一个自由。无论是《思想革命》和《祖先崇拜》这种“正经”文章，还是《麻醉礼赞》里的“别扭的写法”，抑或是《金鱼》里的鉴赏里混有批评，其无不出于对民族的爱与关怀。正是其日后在《两个鬼的文章》里所说的：“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甚么改变，所主张的是革命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sup>31</sup>，“我自己相信，我的反礼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旧思想而成的东西，是自己诚实的表现，也是对于本国真心的报谢，有如道士或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心想献出来，人家收受与否那是别一问题，总之在我是最贵重的贡献了”<sup>32</sup>。这就是周作人对民族“爱之深，责之切”的情感表现。

---

<sup>3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两个鬼的文章〉，《过去的工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88。

<sup>3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两个鬼的文章〉，《过去的工作》，页89。

这种出于对民族未来的关怀与思考所提出的文化批判与揭示正是周作人散文世界的“真实”表现。

## 第二节 出于真诚的自我直视

正如他所提倡的“疾虚妄”，“爱真实”一般，周作人待人处事非常的真诚，毫不做作。对于自己，他更是极为严厉，时时自我审视，刻刻自我反省。而这种对自我的关照与探索，周作人似乎都毫无保留地倾述在其小品散文中。有如其作于1921年的小品散文《胜业》里所言：

我既非天生的讽刺家，又非预言的道德家；既不能做十卷《论语》，给小孩们背诵，又不能编一部《笑林广记》，供雅俗共赏；那么高谈阔论，为的是什么呢？野和尚登高妄谈般若，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更为有益。所以我的胜业，是在于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但这不过在我为胜。<sup>33</sup>

“胜业”本来是一个佛教用语，周作人把它移植到世俗的生活里来，也就有了指自己的专业的意思。<sup>34</sup>周作人自我分析道：“我既非天生的讽刺家，又非预言的道德家；既不能做十卷《论语》，给小孩们背诵，又不能编一部《笑林广记》，供雅俗共赏；那么高谈阔论，为的是什么呢？”五四新文学初期，周作人是赫赫有名

<sup>3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胜业〉，《谈虎集》，页49。

<sup>34</sup>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页85。

的理论家、批评家，发表过如《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论“黑幕”》等极为尖锐的文章，态度极为偏激。正如其说所说：“最初的主张未必真是简单的文字救国，总之相信文字之力，以为要革命或改造可以文学运动为基础”，“但是后来也有所转变了”<sup>35</sup>。周作人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当他意识到一味地以文学高喊革命与现实理想有着一段距离时，他开始反省他的“高谈阔论”是否奏效。他把自己比作“登高妄谈般若”的“野和尚”，是那么的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地不切实际，还不如“在僧房里译述几章法句”还来得有用。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他的“胜业”是“停止制造（高谈阔论的话）而实做行贩”。因为，“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么？”而他所谓的“行贩”既是贩卖，把西方的东西贩卖到中国，也就是翻译介绍西方文化的意思。<sup>36</sup>正是时时自我直视，周作人发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局限性，从此更从实际工作下手，找到自己的“胜业”。而这项“胜业”，周作人坚持了一生，从来没有中断过。

又如他在1923年7月30日所作的一篇小品散文《寻路的人》：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

<sup>3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过去的工作》，页83。

<sup>36</sup>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页87。

我曾在西四牌楼看见一辆汽车载了一个强盗往天桥去处决，我心里想，这太残酷了，为什么不照例用敞车送的呢？为什么不使他缓缓的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走过应走的路程，再到应到的地点，却一阵风的把他送走了呢？这真是太残酷了。

我们谁不是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却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论，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与乐，至于路线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南，或是由东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sup>37</sup>

文章一开始自就称为“寻路的人”，意即“我”还未在人生的道路上找到一个明确的指标，还看不见未来。于是，“我”唯有“日日走着路寻路”，但“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然而，现在“我”知道了，原来人生就是“在悲哀中挣扎着”，这是很自然的，一切的生物无一不是这样的生存着，只是“我们”单独意识到罢了。“我”意识到“路的终点是死”，而“我们”在死前最终也不得不挣扎着。既然如此，那“我”就干脆在“到应到的地点”（死）之前，好好地经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尽量的享受这些应得的苦与乐”。至于应选哪一条路，那已经不再重要了。这里，周作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作出了反思。当他知道人终究得死，而未来是无法预料的，他唯有选择相信支撑现实的力量始于未来，好好地生活在当下，无论你选择了那一条路，也要为即将到来的、充满变化而美好的未来做好“准备”，不让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周作人因而找到了自己，不再动摇。正如他在日

---

<sup>3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寻路的人〉，《过去的生命》，页 43-44。

后所言：“民国十年以前我还很是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寻找的人》一篇便是我的表白。”<sup>38</sup>

再者，周作人在 1926 年的一篇题为《两个鬼》的小品散文里作了一次极为深刻的自我关照。文章的一开始说到“在我们的心头住着 Du 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sup>39</sup>：

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他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一切的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秘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坡脚骨”。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烟地走了。可是他并不走远，只在街头街尾探望，他看绅士领了我走，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于是他又赶出来大骂道，“Nohk oh dausangtzr keh niarngsaeh, fialuctong tserntseuzeh doodzang kaeh moavaeh toang yuachu!”（按此流氓文大半有音无字，故今用拼

---

<sup>38</sup>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后记〉，《谈虎集》，页 393。

<sup>39</sup>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两个鬼〉，《谈虎集》，页 252。

音，文句也不能直译，大意是说“你这混账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作有趣。”）这一下之子，棋又全盘翻过来了。而流氓专政即此渐渐地开始。<sup>40</sup>

周作人通过理性的思维，将自己投射进艺术化的形象里头，却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其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他将自我的内心剖析为“绅士鬼”与“流氓鬼”之间的拉扯与平衡。他听人们说“诸事都应该澈底才好”，不过，他又说“我大约不能够这样做。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我希望这两个鬼能够立宪，不，希望他们能够结婚”。“绅士的态度”是平和的，理智的，谦虚的；“流氓的精神”是反抗的，批判的，偏激的，这是周作人对自己真实的解读，也是对其文章的剖析，因为个人的思想会反映在文章里。周作人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文章时，说自己的文章时“两个鬼的文章”，分别是“流氓鬼”和“绅士鬼”，说得好一点，也可以说叛徒与隐士。<sup>41</sup>以文章而言，则分别是正经与闲适文章。这两者的结合正是周作人的理想与追求。

此外，周作人在 1930 年写了一篇名为《中年》的小品散文，里头对自己岁到中年是否已“不惑”作出了反思。文章一开始就引孔子的话说：“四十而不惑”<sup>42</sup> 以及其友人说的：“人到了四十岁便可以枪毙”<sup>43</sup>两种不同的观点来加以探讨。其结论是：“若曰，四十可以不惑，但也可以不不惑，那么，那时就是枪毙也不足惜云儿”<sup>44</sup>，因为“平常中年以后的人大抵糊涂荒谬的多”<sup>45</sup>，正如兼好法师所说，

---

<sup>4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两个鬼〉，《谈虎集》，页 252-253。

<sup>41</sup> 参阅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两个鬼的文章〉，《过去的工作》，页 86-91。

<sup>4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1。

<sup>4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1。

<sup>4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1。

<sup>4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1。

“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记自己的老丑”<sup>46</sup>，“想在人群中胡混，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服了解，至可叹息是也”<sup>47</sup>。又说“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就很有不惑的希望，让他多活几年也不碍事”<sup>48</sup>。于是，他就开始自省：

我决不敢相信自己是不惑，虽然岁月是过了不惑之年好久了。但是我总想努力不至于不惑，不要人情物理都不了解。本来人生是一贯的，其中却分几个段落，如童年，少年，中年，老年，各有意义，都不容空过。譬如少年时代是浪漫的，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到了老年差不多可以说是待死堂的生活吧。然而中国凡事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或者可以免于落伍之讥，实在犹如将昼作夜，“拽直照原”，只落得不见日光而见月亮，未始没有好些危险。我想最好还是顺其自然，六十过后虽不必急做寿衣，唯一只脚确已踏在坟里，亦无庸再去讲斯坦那赫博士结扎生殖腺了，至于恋爱则在中年以前应该毕业，以后便可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即便在市街战斗或示威运动的从伍里少了一个人，实在也有益无损，因为后起的青年自然会去补充，（这是说假如少年不是都老成化了，不在那里做各种八股，）而别一队伍里也就多了一个人，有如退伍兵去研究动物学，反正于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并无什么妨害的。<sup>49</sup>

---

<sup>4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1。

<sup>4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1-52。

<sup>4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2。

<sup>4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2。

周作人在自我审视的同时，也对复杂的中国社会情况加以分析，最后得出“最好是顺其自然”，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再去闹革命，而是安分于了解人情物理。但，接下来他又说这“实在是不大容易的事”<sup>50</sup>，因为有些事情是难以容忍的，“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sup>51</sup>的道学家和超人志士，还有那些伪善的道德家，这些都应加以批判，“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sup>52</sup>。正如其在《雨天的书·自序二》里所言：“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建立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sup>53</sup>。文章的结尾如此言道：“我这些意思恐怕都很有老朽的气味，这也是没有法的事情。年纪一年年的增多，有如走路一站站的过去，所见既多，对于从前的意见自然多少要加以修改。这是得呢失呢，我不能说”<sup>54</sup>。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随着年龄与经验的生长，时时刻刻地理性地自我检讨，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国家更是无不关心，并尝试在不断的自我探索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位子。

透过这几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以不同的艺术形象出现在文章中，无论是《胜业》里的“野和尚”，《寻路的人》里的“日日走着路寻路的寻路的人”，还是《两个鬼》里的“流氓鬼”与“绅士鬼”，抑或是《中年》里的“摆脱不了道

---

<sup>5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2。

<sup>5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3。

<sup>5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4。

<sup>5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自序二〉，《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 3。

<sup>5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 54。

德家的道德家”，都是出于周作人真诚的自我直视，都是其自我真实的反映。周作人正是把自己放进这些艺术形象进行自我探索，进而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就是周作人散文世界的“真实”体现。

### 第三节 出于人生味的缺乏

看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我们不难发现其笔下所描绘的凡俗人世极为细腻动人。一件小小的、不为常人注意的事物，在其眼中却会散发出无限的光辉，像是披上了一层薄纱，感觉即熟悉又神秘，不禁让你反复回味其中的甘甜。然而，对凡俗人世如此细微入至的观察，却又是“缺乏人生味”<sup>55</sup>的一种表征。正如胡兰成所言：“周作人因为太理性了，所以缺乏人生味。看他喝苦茶、听雨、看云，对花鸟虫鱼都寄予如意，似乎是很重人生味，其实因为这人生味正是他所缺乏的。人生不是给你去体会的，有作为的人是相忘于人生味，有如鱼之相忘于江湖。”<sup>56</sup>因为缺乏，所以追求，所以给予多于常人的关注。因此，敏感的读者会在其感性的文字里隐隐约约地牵出淡淡的忧伤。笔者认为，这种甜中带苦、温馨中带有苦涩的人生体会就是出于其对人生味的缺乏与渴望。这种情况多见于其感性随笔，尤其见于《雨天的书》。《雨天的书·自序一》里有云：“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再看天色，也就愈觉的阴沉……想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也

---

<sup>55</sup> 这里所指的“人生味”主要是指在现世里能充分、踏实、平凡、自然、安乐、富足且充满人情味地生活。相反的，“缺乏人生味”则在现世里活得不踏实、焦虑、烦躁不安、寂寞、孤独、空虚、麻木且无人情味。因此，他们渴望摆脱寂寞，向往平凡、自然且富人情味的生活。

<sup>56</sup> 胡兰成：〈周沈交恶〉，《乱世文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7，页48。

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两天的气闷光阴罢了。”<sup>57</sup>

又云：“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sup>58</sup>，然而“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sup>59</sup>，“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sup>60</sup>。正是出于人生味的缺乏，周作人才会被天气影响，于是阴沉、心思散漫、脾气褊急、心境粗糙荒芜。所以，他才想做点能让其踏实的正经事、才极慕平淡自然的作文境地、才希望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

《雨天的书》里就有一篇极具人生趣味的闲适小品——《喝茶》。文章一开始就谈及“茶道”的意思：“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日本之“象征的文化”里的一种代表艺术。”<sup>61</sup>然而，周作人接着又说“我现在想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罢了”<sup>62</sup>：

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随笔》（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确是很有趣味的书，但冬之卷里说及饮茶，以为英国家庭里下午的红茶与黄油面包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支那饮茶已历千百年，未必能领略此种乐趣与实益的万分之一，则我殊不以为然。红茶带“土斯”未始不可吃，但这只是当饭，在

---

<sup>5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自序一〉，《雨天的书》，页1。

<sup>5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自序二〉，《雨天的书》，页4。

<sup>5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自序二〉，《雨天的书》，页4。

<sup>6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自序二〉，《雨天的书》，页4。

<sup>6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喝茶〉，《雨天的书》，页3。

<sup>6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喝茶〉，《雨天的书》，页53。

肚饥时食之而已，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Book of Tea 1919）里很巧妙的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中国人上茶馆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sup>63</sup>

我们不难发现周作人对“喝茶”有着独特的品味，他所欣赏的是并非将喝茶当正餐的“英国式喝茶”，而是日本式的“自然主义的茶”。因此，他喜欢中国人上茶馆，“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刚从沙漠里回来的样子”，觉得这“颇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即“自然之妙味”。然而，“只可惜近来太是洋场化，失了本意，其结果成为饭馆子之流，只在乡村间还保存一点古风，唯是屋宇器具简陋万分，或者但可称为颇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许为已得喝茶之道也”。这里，我们可以略略地感觉到，周作人在细细地谈喝茶这种悠闲享乐的当儿，带出的却是淡淡的惋惜之叹。悠闲地、自然地喝茶，是他所喜爱的，是他所向往的。然而，这种悠闲自然的喝茶情境，在中国却是少有的。又如：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

---

<sup>6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喝茶〉，《雨天的书》，页 53-54。

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中国喝茶时多吃瓜子，我觉得不很适宜，喝茶时可吃的东西应当是轻淡的“茶食”。中国的茶食却变了“满汉馍馍”，其性质与“阿阿兜”相差无几，不是喝茶时所吃的东西了。

64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所向往的是在“为名为利”的现实生活里，以“喝茶”来享有“偶然的片刻优游”。这样，就得以“得半日之闲”、“抵十年的尘梦”。然而，可惜的是，中国配茶的“茶食”不符其“清淡”的要求，因此，其“悠闲自然地喝茶”的渴望也就无法实现了。他在文章的结尾又说：

日本用茶淘饭，名曰“茶渍”，以腌菜及“泽庵”（即福建的黄土萝卜，日本泽庵法师始传此法，盖从中国传去）等为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风味。中国人未尝不这样吃，唯其原因，非由穷困即为节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为可惜也。<sup>65</sup>

从谈喝茶到谈茶食到谈茶饭，周作人所感叹的正是他在中国国境里所缺乏的，悠闲的，自然的，清淡的“人生味”。这也正是周作人文章“闲适中带有苦味”的原因。

又如《苍蝇》一文：

苍蝇不是一件很可爱的东西，但我们在做小孩子的时候都有点喜欢他。我同兄弟常在夏天乘大人们午睡，在院子里弃着香瓜皮瓤的地方捉苍蝇——苍蝇共有三种，饭苍蝇太小，麻苍蝇有蛆太脏，只有金苍蝇可用。金苍蝇即青蝇，

<sup>6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喝茶〉，《雨天的书》，页 54。

<sup>6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喝茶〉，《雨天的书》，页 55-56。

小儿谜中所谓“头戴红缨帽，身穿紫罗袍”者是也。我们把它捉来，摘一片月季花的叶，用月季的刺钉在背上，便见绿叶在桌上蠕蠕而动，东安市场有卖纸制各色小虫者，标题云“苍蝇玩物”，即是同一的用意。我们又把他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心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他便上下颠倒的舞弄，名曰“戏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sup>66</sup>

周作人忆起童年时玩苍蝇的天真浪漫，然而接下来他却说：“我们现在受了科学的洗礼，知道苍蝇能够传染病菌，因此对于他们很有一种恶感。”<sup>67</sup>这里，带出的是他对长大后受科学洗礼的现实世界对其原本天真浪漫的童年的破坏；展现了原本美好的生活之余，也揭示了社会的现实。接下来，他又说道：

苍蝇的固执与大胆，引起好些人的赞叹。何美洛思（Homeros）在史诗中常比勇士于苍蝇，他说，虽然你赶他去，他总不肯离开你，一定要叮你一口方才罢休。又有诗人云，那小苍蝇极勇敢地跳在人的肢体上，渴欲饮血，战士却躲避敌人的刀锋，真可羞了。<sup>68</sup>

又言：

在日本的俳谐中则蝇成为普通的诗料，虽然略带湫秽的气色，但很能表出温暖热闹的境界。小林一茶更为奇特，他同圣芳济一样，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

---

<sup>6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苍蝇〉，《雨天的书》，页 57。

<sup>6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苍蝇〉，《雨天的书》，页 58。

<sup>6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苍蝇〉，《雨天的书》，页 58。

苍蝇当然也是其一。检阅他的俳句选集，咏蝇的诗有二十首之多，今举两首以见一斑。一云，

“笠上的苍蝇，比我更早地飞进去了。”这诗有题曰《归庵》。又一首云，

“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sup>69</sup>

他说：“我读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所以也是无法。”<sup>70</sup>这里，周作人分别在希腊史诗与日本俳句中发现了苍蝇的“勇敢”与“可爱”。然而，他也同时发现了自己所缺乏的“生活情趣”之发现，即“人生味”的缺乏。文章的结尾更是说道：

据路吉亚诺思说，古代有一个女诗人，慧而美，名叫默亚，又有一个名妓也以此为名，所以滑稽诗人有句云：“默亚咬他直达他的心房。”中国人虽然永久与苍蝇同桌吃饭，却没有人拿苍蝇作为名字，以我所知只有一二人被用为浑名而已。<sup>71</sup>

周作人所感叹的不只是自己“人生味”的缺乏，更是感慨中国人缺乏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对“情趣”的发现，以至生活枯燥乏味。这也正是周作人文章“闲适中带有苦味”的原因。

透过《喝茶》与《苍蝇》两篇闲适小品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很有“人生味”的同时，也揭示了自己，以至中国民族缺乏对“人生味”

---

<sup>6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苍蝇〉，《雨天的书》，页 59。

<sup>7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苍蝇〉，《雨天的书》，页 59。

<sup>7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苍蝇〉，《雨天的书》，页 59-60。

的发现悲哀，导致文章“闲适中带有苦味”。这就是周作人在其散文世界中所体现的“真实”。

出于对人生味的缺乏，周作人更是轻易地回忆起从前的美好，有如其怀旧小品——《娱园》。文章的一开始就说道：“有三处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因为恋爱的缘故。”<sup>72</sup>，其中一处就是“故乡城外的娱园”<sup>73</sup>：

娱园是“皋社”诗人秦秋渔的别业，但是连在住宅的后面，所以平常只称作花园。这个园据王眉叔的《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综，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园筑于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年），我初到那里是在光绪甲午，已在四十年后，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时““秋夜联吟”的风趣了。<sup>74</sup>

这里，文章所带出的是昔日的美好已不复存在的感慨。接下来，文章也提到住在娱园里的，其所爱恋着的“她”：

忘记了是哪一年，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吧。那时舅父的独子娶亲（神安他们的魂魄，因为夫妇不久都去世了），中表都聚在一处，凡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我称她为姊，她也称我为兄，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所以我隐秘的怀抱着的对于她的情意，当然只是单面的，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此刻想起来，倒似乎颇有中古诗人（Troubadour）的余风

---

<sup>7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娱园〉，《雨天的书》，页 45。

<sup>7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娱园〉，《雨天的书》，页 45。

<sup>7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娱园〉，《雨天的书》，页 45。

了。……有一次大家在楼上跳闹，我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她的一个兄弟也一同闹着，不曾看出什么破绽来，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sup>75</sup>

这就是周作人所得意的一件往事。然而，“在外边飘流了十二年之后，回到故乡，我们有了儿女，她也早已出嫁，而且抱着痼疾，已经与死当面立着了，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她不久就平安过去”<sup>76</sup>，“至今她只有一张早年的照相在母亲那里……”<sup>77</sup>文章的最后这样说道：

自从舅父全家亡故之后，二十年没有再到娱园的机会，想比以前必更荒废了。但是她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火焰（Fiammetta）的余光所映照着的。<sup>78</sup>

由出于人生味的缺乏到怀念从前那个快乐、无忧无虑、单纯天真的自己到吊念曾经爱恋着的“她”，周作人带出的是却是“往事不堪回首”、“昔日美好已不复存在”的悲叹。然而，却还是惦记着，有如文章一开始所言：“因为恋爱的缘故”，因为恋爱总是美好的，即使一切已不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周作人文章“怀旧中带有苦味”的原因。

---

<sup>7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娱园〉，《雨天的书》，页 46。

<sup>7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娱园〉，《雨天的书》，页 47。

<sup>7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娱园〉，《雨天的书》，页 47。

<sup>7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娱园〉，《雨天的书》，页 47。

又如另一篇怀旧小品——《乌篷船》。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散文是周作人写给自己——子荣君（周作人笔名之一）的书信。通过这篇自白式的文章，我们得以更为贴切地窥探周作人的内心世界。文章的一开始如此说道：

接到手书，知道你要到我的故乡去，叫我给你一点什么指导。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sup>79</sup>

信中，周作人向子荣君表示“我的故乡”并不是一个可怀恋的地方，但是，由于在那里生长，究竟知道一点情形的，而他要说的“不是那里的风土人情”<sup>80</sup>，是故乡的“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sup>81</sup>，即“乌篷船”。文章细致地介绍了“乌篷船”的构造特点后，就向子荣君娓娓细述了坐船时所须注意的事项：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电车的那样的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们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才及英里三分之一），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荡，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门外的鉴湖一带，贺家池，壶筋左近，我都是喜欢的，或者往娄公埠骑驴去游兰亭（但我劝你还是步行，骑驴或者于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苍然的时候进城上都挂着薛荔的东门来，倒是颇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静，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

<sup>7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乌篷船〉，《泽泻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27。

<sup>8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乌篷船〉，《泽泻集》，页27。

<sup>8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乌篷船〉，《泽泻集》，页27。

好看，只可惜这一带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记了。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只可惜讲维新以来这些演剧与迎会都已禁止，中产阶级的低能人别在“布业会馆”等处建起“海式”的戏场来，请大家买票看上海的猫儿戏。这些地方你千万不要去。<sup>82</sup>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周作人对故乡风土人情那写不尽的怀恋与喜爱。故乡的一切对他而言是那么的可爱，这样的熟悉。然而，却又在一丝丝的眷恋中，潜藏着一缕缕的感伤——只可惜。信的最后如此写道：

你到我那故乡，恐怕没有一个人认得，我又因为在教书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谈闲天，实在抱歉而且惆怅。川岛君夫妇现在偕山下，本来可以给你介绍，但是你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恐怕已经离开故乡了。<sup>83</sup>

周作人所感慨的正是那今非昔比，那已经回不去的美好从前。出于人生味的缺乏，周作人不禁着笔写信给自己，企图通过缅怀过去来倾诉内心的渴求，尝试找回从前那个无忧无虑、单纯快乐的自己，以便能为寂寞冷淡的心带来些许的温暖。然而，追忆总归追忆，苦中作乐还是让人倍感心酸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周作人文章“怀旧中带有苦味”的原因。

---

<sup>8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乌篷船〉，《泽泻集》，页 28-29。

<sup>8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乌篷船〉，《泽泻集》，页 29。

透过《娱园》与《乌篷船》两篇怀旧小品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在缅怀过去的美好的同时，也揭示了他因人生味的缺乏而露现出的孤独与寂寞，导致其文章“怀旧中带有苦味”。这就是周作人在其文散文世界里所表现的“真实”。

同样出于对人生味的缺乏，周作人于是从民俗学（尤其“谈鬼”）下手，企图从中找寻其所缺乏的健全的物理和深厚的人情，有如其在《苦竹杂记·后记》里所云：“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sup>84</sup>也因为“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周作人落得了“文抄公”<sup>85</sup>的称号。周作人在众多的古书堆里遇见了“故人”<sup>86</sup>，也发现了其中所蕴含的真实的人情物理，打从“民国廿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的当”<sup>87</sup>然而，此类写法却得不到多数读者与论家的理解，以“文抄公”讥其多年。周作人唯有感慨道：“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不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sup>88</sup>此可谓苦上加苦，可悲也。

《鬼的生长》为此类文章。其文一开始就探讨“人死后为鬼，鬼在阴间或其他地方究竟是否一年年的照常生长”<sup>89</sup>的问题。接下来就从众多的古书中引出谈及鬼

---

<sup>8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后记〉，《苦竹杂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221。

<sup>85</sup> 作者特有的一种切入方式，即以阅读为契机，依靠知识的绵延和思想的碰撞，深入到文化、文明、人类、历史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而具体写法，则是大段摘抄原著，中缀少量按语。也就是后人所谓“书话”。

<sup>86</sup> 投机、趣味相同者也。

<sup>8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原序〉，《书房一角》，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3。

<sup>8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后记〉，《苦竹杂记》，页221。

<sup>8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鬼的生长〉，《夜读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161。

之生长的段落以加以探讨。文章的最后为周作人对此问题探讨的意见与心得。其文曰：

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陶公千古旷达人，其《归园田居》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神释》云：“应尽便须尽，无复更多虑”，在《拟挽歌词》中则云：“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陶公于生死岂尚有迷恋，其如此说于文词上固亦大有情致，但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常人更执着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其存在之状况则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恶而稍稍殊异，无所作为而自然流露，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sup>90</sup>

周作人以因而从古书堆里得出“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也发现了说鬼背后人的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又如《说鬼》一文中云：

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我的打油诗云，“街头终日听谈鬼，”大为志士所诃，我却总是不管，觉得那鬼是怪有趣的物

---

<sup>9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鬼的生长〉，《夜读抄》，页 164-165。

事，舍不得不谈，不过诗中所谈的是那一种，现在且不必说。至于上边所讲的显然是老牌的鬼，其研究属于民俗学的范围，不是讲玩笑的事，我想假如有人决心去作“死后的生活”之研究，实是学术界上破天荒的工作，很值得称赞的。英国弗来则博士有一部书专述各民族对于死者之恐怖，现在如只以中国为限，却将鬼的生活详细地写出，虽然是极浩繁困难的工作，值得当博士学位的论文，但亦极有趣味与实益，盖此等处反可以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还要可信凭也。<sup>91</sup>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周作人对鬼的研究极为重视，因为他发现通过对鬼的情况与生活“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sup>92</sup>，“可以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sup>93</sup>，而这“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还要可信凭也”<sup>94</sup>。有如其在《看云集·水里的东西》中所言：“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sup>95</sup>由此可见，这不只是周作人人生味之缺乏，也是中国民族人生味之缺乏。周作人发现，人们总是在追求更高远的理想时，忘了自己的初衷，以至迷失自我。意识到这一点的周作人，总是努力地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透过《鬼的生长》与《说鬼》两篇谈鬼随笔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出于人生味的缺乏，在探讨有关鬼的情况与生活的同时，也揭示了鬼背后所蕴含的博大的人情。而这人情往往是出于在世的人对已死之人的留恋，从中可窥见中国民族真

---

<sup>9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说鬼〉，《苦竹杂记》，页 138。

<sup>9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说鬼〉，《苦竹杂记》，页 138。

<sup>9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说鬼〉，《苦竹杂记》，页 138。

<sup>9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说鬼〉，《苦竹杂记》，页 138。

<sup>9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水里的东西〉，《看云集》，页 36。

心实意的真性情流露，因而导致其文章“人情中带有苦味”。这就是周作人在其文散文世界里所体现的“真实”。

通过这几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以感性的眼光，发现了凡俗人世细微处所绽放的人性光辉，同时也揭示了人世间的“苦味”，无论是闲适小品中的“闲适中带有苦味”，还是怀旧小品中的“怀旧中带有苦味”，抑或是谈鬼随笔中的“人情中带有苦味”，都是出于其人生味的缺乏。也正如此，在发现自己缺乏对人间真性情的理解的同时，周作人也曝露了中国民族对人自然本性的忽略。这就是周作人散文世界的“真实”体现。

总结而言，周作人散文中所体现的“真实”乃是出于其对民族未来的关怀，出于真诚的自我直视，以及出于人生味的缺乏。出于对民族未来的关怀，周作人在其散文中对民族的劣根性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正经”，“别扭的写法”，以及“鉴赏里混有批评”是其呈现的艺术效果；出于真诚的自我直视，周作人在其散文中对自我的存在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以不同的艺术形象出现在文章中时期呈现的艺术效果；出于人生味的缺乏，周作人在其散文中对凡俗人世细微处作出了人性的发现，“闲适中带有苦味”，“怀旧中带有苦味”，以及“人情中带有苦味”是其呈现的艺术效果。对于这三项课题的关注，不禁使周作人真切地深入探讨其中的本质与规律，并将其实践在散文书写中，导致其在散文创作时有意无意地以体现“真实”为创作原则与追求。于此同时，周作人也在这不断的探索与寻问中有意无意地摆脱束缚，还原最初的自己，进而通过自我定位为自己找寻安身立命之处。正如其“人的文学”所主张，只有肯定自己身为“人”的存在价值，爱自己，才得以进而爱人

类。也正因为如此，周作人的散文无不散发出“真实”的光辉。真实，也因此成为周作人散文最大的魅力。

### 第三章 周作人散文对“真实”追求的背后

通过对周作人散文中所体现的“真实”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周作人在其文章中所探究的皆是对人的本性，以及人类或民族生活的本质与规律的发掘与揭示，并对一切违反人性与人类生活自然、健全、自由的传统思想制度给予深刻的批判，企图还原“真实”的人性与人类生活。这就表示，周作人所表现的“真实”散文创作观乃是出于其对人与人类的重新发现，即贯穿其一生的“人的文学”思考命题。人生活于社会，其思想与人的现实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周作人对于“人”的真理的重新发现乃是源自于其所接受的知识启发，以及其人生经历的影响。因此，本章将会通过传记考察的方式，分别侧重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尝试归纳出周作人是如何从其相关的知识背景与人生经历里得到对“人”的重新发现，以及对其创作观产生了怎样的启发与影响进行探讨。

## 第一节 知识背景的启发

周作人对某些知识的吸收带给他思想上很大的启发，进而构成了其思想基础，并成为其看世界的准绳。周作人从西洋的求知精神，日本的人情美，以及国文的非正宗的别择法里得到对“人”的重新发现皆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有着极大的启发。正如其在晚年为自己的文章作总结时所言：“我所注意，所想要明白的事情只是关于这几国的，即一是希腊，二是日本，其三最后却最重要的是本国中国。”<sup>96</sup> 这里主要是侧重在理论上，探讨周作人所得到的“人”的重新发现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上的启发。

西洋的求知精神。周作人从西洋的求知精神里得到对“人”的重新发现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有着极大的启发。20世纪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并没有真正形成，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找来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范本。<sup>97</sup>不同于同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拿来主义”<sup>98</sup>，周作人在狂热地吸收西方文化营养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北大的支路》里如此说道：

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希

---

<sup>9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过去的工作〉，《过去的工作》，页81。

<sup>97</sup> 陈思和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页30。

<sup>98</sup> 这个说法起于鲁迅。从吸收西方文化营养的本身态度而言，“拿来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只取适合或有利的，而不是从根本上了解中西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结合的可能性，也不能对中西文化作出理性的科学研究，以及尝试其彼此的融合。参见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39。

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一瞥，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独特的价值，据臆见说来他的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地方，总是制度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sup>99</sup>

周作人对古希腊的研究是贯穿其一生的，因为他真切地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得从根子上来研究和學習。古希腊文化对周作人的思想有着极深刻的启发，其一是在雅典精神方面。他一生都研究古希腊文化<sup>100</sup>，到晚年 80 多岁了，还完成一部文学巨作《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的翻译，他说这是他最愉快的工作，最后遗嘱尚云：“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sup>101</sup>。周作人说对这部对话集主要是“阐发神道命运之不足信，富贵权势之不足恃，而归结于平凡生活最适宜”<sup>102</sup>。这也是周作人所强调的“人”性的自然发展。他对希腊文化的兴趣和研究态度是有选择的，比较偏重于理性的、民主的、求知的传统，我们也可以称其为雅典精神<sup>103</sup>。<sup>104</sup>他在《希腊人的好学》一文中云：“好学（To philomathes）是希腊人的特点……他们对于学，即知识，很有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态度。”<sup>105</sup>文中又引英国部丘教授杂在《希腊的好学》这篇讲义里所言：

---

<sup>99</sup>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北大的支路〉，《苦竹杂记》，页 216-217。

<sup>100</sup>作文介绍之外，又移译不少古希腊人著述，如《希腊拟曲》、《希腊神话》、《全译伊索寓言集》、《财神》、《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和《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等。

<sup>101</sup>参见周作人 1965 年 4 月 26 日日记。

<sup>102</sup>详见周作人著：〈愉快的工作〉，陈子善选编《知堂集外集·四九年以后》，长沙：岳麓书社，页 595-598。

<sup>103</sup>雅典精神是古希腊的主流，很早就开始研究科学、民主、理性，进行学理的讨论。见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页 32。

<sup>104</sup>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页 32。

<sup>105</sup>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希腊人的好学〉，《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 84。

自有史以来，知这件事在希腊人看来似乎它本身就是一件好物事，不问他的所有的结果。他们有一种眼光锐利的，超越利益的好奇心，要知道大自然的事实，人的行为与工作，希腊人与外邦人的事情，别国的法律与制度。他们有那旅人的心，永远注意着观察记录一切人类的发明与发见。……希腊人敢于发为什么的疑问。那事实还是不够，他们要找寻处事实（To hoti）后面的原因（To dioti）。<sup>106</sup>

周作人对希腊人的好学精神非常的钦佩，不禁感叹：“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其实，实用也何尚不是即在其中。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sup>107</sup>，相比于“中国格物往往谈玄”<sup>108</sup>，他认为还不如希腊人的“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来得实用来得真实，至少他们尚知道“人”之所以为人，而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我相信必须个人对于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Thales）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已’，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sup>109</sup>周作人因而以希腊人的“爱真实”批判了中国人的“虚妄”。在《希腊之余光》一文里，周作人把希腊精神归结为求知、求真、求美三条<sup>110</sup>。这三条加上《路吉阿诺斯对话集》里所表现的化神为凡人的思想，对周作人一生的创作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sup>10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希腊人的好学〉，《瓜豆集》，页 84。

<sup>10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希腊人的好学〉，《瓜豆集》，页 85。

<sup>10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希腊人的好学〉，《瓜豆集》，页 86。

<sup>10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妇女运动与常识〉，《谈虎集》，页 261-262。

<sup>110</sup> 参阅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希腊之余光〉，《苦口甘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 50-56。

其二为希腊神话。周作人说：“我到东京的那年（1906），买得（Gayley）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了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sup>111</sup>他说：“当初听说要懂西洋文学须得知道一点希腊神话，所以去找一两种参考书来看，后来对于神话本身有了兴趣，便又去别方面寻找……安特路朗的则是神话之人类学派的解说，我又从这里引起对于文化人类学的趣味来。”<sup>112</sup>安特路朗的神话之人类学派的解说使周作人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也让他懂得同类的故事<sup>113</sup>。不但如此，周作人也知道了文化人类学，又称社会人类学，是专研究礼教习俗这一类的学问，据他说研究有两方面，其一是野蛮人的风俗思想，其二是文明国的民俗，盖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是现今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sup>114</sup>周作人认为社会人类学比神话学用处更大，“有些我们平常最不可解的神圣或猥亵的事项，经那么一说明，神秘的面幕倏尔落下，我们懂得了时不禁微笑，这是同情的理解，可是威严的压迫也就消解了。”<sup>115</sup>这么一来，周作人得以更深一层地了解“人”。此外，还有一位原籍芬兰而寄居英国的威思忒玛克教授，他的大著《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两册，对周作人的影响也很深，“威思忒玛克的书是阐明道德流变的专著，使我们确实明了的知道了道德的真相，虽然因此不免打碎了些五色玻璃似的假道学的摆设，但是为生与生生而有的道德的本义则如一

---

<sup>11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癸——我的杂学五，六〉，《知堂回想录》（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757。

<sup>11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癸——我的杂学五，六〉，《知堂回想录》（下），页757。

<sup>113</sup> 取别民族类似的故事来作比较，以现在尚有存留的信仰推测古时已经遗忘的意思，大旨可以明了，盖古希腊人与今时某种土人其心理状态有类似之处，即由此可得到类似的神话传说之意义。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子——我的杂学七，八〉，《知堂回想录》（下），页761。

<sup>11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子——我的杂学七，八〉，《知堂回想录》（下），页762。

<sup>11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子——我的杂学七，八〉，《知堂回想录》（下），页762-763。

块水晶，总是明澈的看得清楚了。”<sup>116</sup>于是，周作人揭示了假道学的真面目，还“人”一个自由。周作人还自我解释道：“我对于人类学稍有一点兴味，大抵只是为人，而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与发达为主”，“但是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严几道古雅的译语所云化中人位，我们也是很想知道的，那么这条路略一拐弯便又一直引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sup>117</sup>可以看出，周作人急于为“人”定位。此外，周作人对于儿童学的兴趣，可以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周作人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做小形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乃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sup>118</sup>周作人因而知道“儿童”同样身为“人”，他有他的权利与自由，须得到认同与尊重。因此，在儿童教育方面，周作人提倡童话与儿歌，主张儿童应该读文学作品不可单读那些商人们编撰的读本，念完了读本虽然认识了字，却不会读书，因为没有读书的趣味。<sup>119</sup>可见，周作人对儿童心智健全发展的重视。

另外，在性的心理方面，周作人受蔼理斯《性的心理研究》很大的启发。他说：“我学了英文，既不读莎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sup>120</sup>他还说：“性的心理给予我们许多事实与理论，这在别的性学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

---

<sup>11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子——我的杂学七，八〉，《知堂回想录》（下），页763。

<sup>11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丑——我的杂学九，十〉，《知堂回想录》（下），页765。

<sup>11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丑——我的杂学九，十〉，《知堂回想录》（下），页768。

<sup>11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丑——我的杂学九，十〉，《知堂回想录》（下），页768。

<sup>12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寅——我的杂学十一，十二〉，《知堂回想录》（下），页771。

鲍耶尔，凡特威耳特诸人的书里也可以得到，可是那从明净的观照出来的意见与论断，却不是别处所有，我所特别心服者就在于此。”<sup>121</sup>周作人曾在《夜读抄》举例叙说蔼理斯的意见，“以为性欲的满足有些无论怎样异常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为要损害他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他要损及对方或第三者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sup>122</sup>周作人认为蔼理斯的意见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急进，还很有点合于中庸”<sup>123</sup>，并认为“从这里出发去着手于中国妇女问题，正是极好也极难的事，我们小乘的人无此力量，只能守开卷有益之训，暂以读书而明理为目的而已”<sup>124</sup>。周作人为中国妇女打包不平之余，却又深感无力。总而言之，为西洋的求知精神所启发，周作人因而奠定了其终生所提倡的“人的文学”的文艺观。

日本的人情美。周作人从日本的人情美中得到对“人”的重新发现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有着极大的启发。周作人曾在其《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如此说道：“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富于人情。”<sup>125</sup>“富于人情”是周作人对日本的整体印象，也是影响其观察人性的基本准则。体现在其散文创作的就是对“人”真性情的发掘与揭示。

周作人对日本的体察不同于对西洋的只是学问关系，而是关注于日本的地方色彩，即日本的乡土研究。周作人认为，要了解日本，“必须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

---

<sup>12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寅——我的杂学十一，十二〉，《知堂回想录》（下），页771。

<sup>12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性的心理〉，《夜读抄》，页33。

<sup>12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寅——我的杂学十一，十二〉，《知堂回想录》（下），页772。

<sup>12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寅——我的杂学十一，十二〉，《知堂回想录》（下），页773。

<sup>12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日本的人情美〉，《雨天的书》，页119。

才有入处，我以为宗教最是重要，急切不能直入，则先注意于其上下四旁，民间传承正是绝好的一条路径”<sup>126</sup>，因为“我常觉得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sup>127</sup>可以看出，周作人正是从“人”的感情思想出发来作为其评定标准。此外，周作人也喜欢通过地理类得杂地志来观察日本的人情物色，尤其喜欢日本的浮世绘。必须注意的是，“浮世绘的重要特色不在风景，乃是在于市井风俗。背景是市井，人物却多是女人，除了一部分画优伶面貌的以外，而女人又多以妓女为主，因此讲起浮世绘便总容易牵连到吉原游廊，事实上这二者确有极密切的关系。画面很是丰富，色彩也很鲜美，可是这里边常有一抹暗影，或者可以说是东洋色，读中国的艺与文，以至于道也总有此感，在这画上自然也更明了。”<sup>128</sup>周作人注意到浮世绘里藏有“东洋人的悲哀”<sup>129</sup>，所以当作风俗看之外，也“常引起张然之感”<sup>130</sup>。尽管存在着不同国籍与文化的差异，然而，周作人却从浮世绘中感受到同样身为“东洋人”的悲哀。这就表示，“人”真性情的表露是无分别的，是相同的，是会触动你内在的情感，让你不禁感同身受的。这正因为日本“富于人情”，也即是“人的文学”表现自我性情的发端。

此外，周作人也喜欢川柳，或可称风俗诗。川柳是只用十七字音做成的讽刺诗，上者体察物理人情，直写出来，令人看了破颜一笑，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此所谓有情滑稽，最是高品，其次找出人生的缺陷，如绣花针噗哧的一下，叫

---

<sup>12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卯——我的杂学十三，十四〉，《知堂回想录》（下），页776。

<sup>12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卯——我的杂学十三，十四〉，《知堂回想录》（下），页776。

<sup>12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知堂回想录》（下），页780。

<sup>12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知堂回想录》（下），页780。

<sup>13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知堂回想录》（下），页781。

声好痛，却也不至于刺出血来。<sup>131</sup>周作人觉得“这种诗读了很有意思，不过正与笑话相像，以人情风俗为材料”<sup>132</sup>。周作人还喜欢民间娱乐的落语，说“语虽诙谐，却亦是实情”<sup>133</sup>。他喜欢江户文学中的滑稽本，说“把寻常人的平凡事写出来，都变成一场小喜剧，觉得更有意思”<sup>134</sup>。他喜欢俳文集《鹑衣》，喜欢《天之网岛》的“俗曲里礼赞恋爱与死，处处显出人情与义理的冲突”<sup>135</sup>，觉得“日本的平民艺术仿佛善于用优美的形式包藏深切的悲苦”<sup>136</sup>。我们不难发现，周作人所喜爱的皆是日本凡俗人世的“人情”表现。这不禁让他感叹：“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sup>137</sup>于是，周作人在作文时，时时要求自己“应用经验与理性去观察人情与物理”<sup>138</sup>，发掘人的真善美。这就是日本“人情美”对周作人的启发。

国文的非正宗别择法。周作人从国文的非正宗别择法里得到对“人”的重新发现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有着极大的启发。周作人在总结他学国文的经验时，曾如此说道：“我以前常说看闲书代纸烟，这是一句半真半假的话，我说闲书，是对于新旧各式的八股文而言，世间尊重八股是正经文章，那么我这些当然是闲书罢了，我顺应世人这样客气的说，其实在我看来原都是很重要极严肃的东西。重复的说一句，我的读书是非正统的。因此常为世人所嫌憎，但是自己相信其所以有意

---

<sup>13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知堂回想录》（下），页781-782。

<sup>13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知堂回想录》（下），页782。

<sup>13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知堂回想录》（下），页782。

<sup>13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知堂回想录》（下），页783。

<sup>13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巳——我的杂学十七，十八〉，《知堂回想录》（下），页785。

<sup>13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巳——我的杂学十七，十八〉，《知堂回想录》（下），页788。

<sup>13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辰——我的杂学十五，十六〉，《知堂回想录》（下），页783。

<sup>13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中年〉，《看云集》，页52。

义处亦在于此。”<sup>139</sup>周作人读书是非正统的，这是相对于他不喜欢的正经的八股文而言。周作人讨厌八股文的诸多限制与其承载的伪道学，喜欢自由，真实，有趣味的闲书。他说，让他学会看书的是小说，教他懂文言并略知文言趣味的是《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而他感兴趣于杂书，是因为《唐代丛书》，皆是“不正经”的闲书。<sup>140</sup>这个非正宗的别择法一直维持下来，成为周作人搜书看书的标准。这大要有八类：

一是关于《诗经》《论语》之类。二是小学书，即《说文》《尔雅》《方言》之类。三是文化史料类，非志书得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如《梦忆》，《清嘉录》，又关于乱事如《思痛记》，关于倡优如《板桥杂记》等。四是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最著的例如《颜氏家训》，《入蜀记》等。五是博物书类，即《农书》《本草》，《诗疏》《尔雅》各本亦与此有关系。六是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七是佛经之一部，特别是旧译《誓喻》《因缘》《本生》各经，大小乘戒律，代表的语录。八是乡贤著作。

141

在丛多的“杂览”当中，周作人首推佛经。周作人尤其喜欢佛教精神，不过，他所关注的“不是甚深义谛，是印度古圣贤对于人生特别是近于入世法的一种广大厚重的态度，根本与儒家相通而更为彻底”<sup>142</sup>；见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不禁感叹“这里边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文章至今还时时记起，使我感到感激，我想大禹与墨

<sup>13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壬——我的杂学三，四〉，《知堂回想录》（下），页752。

<sup>140</sup> 参阅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壬——我的杂学三，四〉，《知堂回想录》（下），页750-751。

<sup>14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壬——我的杂学三，四〉，《知堂回想录》（下），页751-752。

<sup>14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午——我的杂学十九，二十〉，《知堂回想录》（下），页791。

子也可以说具有这种精神”<sup>143</sup>。这里，周作人被佛经中博大深厚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发现其与儒家精神的共同点，进而发现人类共有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性情。周作人因而重新发现了“人”，更为其“人的文学”打好了思想基础。

通过对周作人知识背景的考察，周作人从西洋的求知精神，日本的人情美，以及国文的非正宗的别择法里得到对“人”的重新发现并构成了周作人以表现“人”为主的思想基础，进而成为其看世界的准绳，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有着极大的启发。他终身坚守的“人的文学”就是最好的证明。

## 第二节 人生经历的影响

周作人的人生经历在他思想上起作很大的影响，进而在复杂矛盾中逐渐巩固了其思想基础，并成为其待人处事的原则。处在变化多端的中国革命时代，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也颇为复杂。至今，对于其人生道路的选择与生平事件的研究还是未能梳理出一条合情合理的脉络，也就是说对于周作人的人生依旧存在着许多还未解开的谜题。这对从事周作人研究的学者而言，无疑是一个难以突破的点。基于所探讨的课题，此节不会紧据周作人的人生脉络加以探讨，而只选几件较为重大且贴近所探讨课题的事件加以解说。因此，此节主要是从周作人思想遭受极大激荡的时期（1917年——1937年）下手，来探讨其所得到的“人”的重新发现对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的影响。

---

<sup>14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拾遗午——我的杂学十九，二十〉，《知堂回想录》（下），页791-792。

周作人在 1906 年赴往日本求学到 1911 年回国期间，在日本接触了大量的西洋文学与思想，也触碰了日本的文化与文学，以及与鲁迅一起从事了一些俄国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这一期间，是周作人思想得到最多启发的时候，也由此奠定了其思想基础。正如黄开发在其著作《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里所言：“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自我人格模式，接受了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并把这种思想看作是自我发展和救国救民的共同出路之所在。”<sup>144</sup>这一点，上节经已有所探讨。这里主要是侧重在现实中，周作人所得到的“人”的重新发现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的影响。

直至 1917 年 1 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采取“古今中外，兼容并包”政策，周作人在蔡元培的多次邀请下，终于接下了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sup>145</sup>这可谓周作人人生的一大转折。这时“文学革命”已经发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先后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sup>146</sup>胡适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和“不避俗字俗语”的“八事”；陈独秀提出“推到雕刻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归结起来则是：“这回作战的单纯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sup>147</sup>这些鼓吹

---

<sup>144</sup> 黄开发：《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页 12。

<sup>145</sup> 止庵：《周作人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页 59-62。

<sup>146</sup> 止庵：《周作人传》，页 63。

<sup>147</sup> 赵家璧主编；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页 1。

白话文的运动，其实也为打到陈腐旧文学的宣言，建立一个人人都懂得文学语言，无意间也推动着“人”的文学。1917年11月，周作人终于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和“小说”两组；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小说组做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展》的报告；1918年2月，周作人于《北京大学日刊》开始征集歌谣。<sup>148</sup>参与这些活动，使得周作人很快成为一个以革新中国文化为宗旨的群体中的重要一员。1918年5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贞操论》，引起极大反响。<sup>149</sup>这是周作人首次在思想问题上向传统观念发难，也让其一举成名。对周作人而言，其意义实际上超出妇女问题之外，乃是要对既有的全部社会道德观念和价值观重新加以评衡，反对一切束缚“人”自由发展的旧传统。周作人随后所写的《祖先崇拜》、《思想革命》等，都是依循这一思路所写的。后来，周作人更是在《每周评论》一连发表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的文学》等。<sup>150</sup>周作人以《人的文学》为核心的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他看来，“人的文学”体现了人的理想，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他才提倡“平民的文学”：“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的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人类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sup>151</sup>他将此称为“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以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相区别。一年后，他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时，把这一主张推倒极致：“这人道主义的文学，我们面称他为人生的文学，又有人称为理想主义的文学；名称尽有异同，实质终是一样，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

<sup>148</sup> 止庵：《周作人传》，页67。

<sup>149</sup> 孙郁，黄乔生：《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页7。

<sup>150</sup> 止庵：《周作人传》，页70。

<sup>151</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平民的文学〉，《艺术与生活》，页5。

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sup>152</sup>显然，这一时期周作人对于文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了解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后来周作人有所反思，觉得光讲文学革命还不够，还必须提倡思想革命。五四时代，周作人以“思想革命”的提倡者登场，多年后他谈及由来时说：“经过那一次时间（按指张勋复辟）的刺激，和以后的种种考虑，这才翻然改变过来，觉得中国很有‘思想革命’之必要，光只是‘文学革命’实在不够，虽然表现的文字改革自然是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不过不是主要的目的罢了。”<sup>153</sup>具体说便是《谈虎集》起头两篇文章：“民国八年《每周评论》发刊后，我写了两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当时并无甚么计划，后来想起来却可以算作一种表示，即是由文学而转向道德思想问题，其攻击的目标总结拢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科举制度之流毒。”<sup>154</sup>《思想革命》等，包括此前那篇《人的文学》，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新的同时也是最本质性的阶段的开始；而对周作人而言，是由此奠定了其一生的思想基础。这也即是他所说的反礼教思想，在此后所有著述中都有所体现。即如其所言：“我从民国八年在《每周评论》上写《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以来，意见一直没有什么改变。”<sup>155</sup>

---

<sup>152</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页 22-23。

<sup>153</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菜子民二〉，《知堂回想录》（下），页 383。

<sup>154</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过去的工作〉，《过去的工作》，页 83。

<sup>155</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两个鬼的文章〉，《过去的工作》，页 88。

1919年5月4日，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政治风暴终于来临。这时，周作人正在东京，听到“五四”的消息，赶回北京，已经是5月18日了。虽然是“五四”以后，但那热烈的气氛仍然是感受着的，特别是亲眼目见六三事件，更是给周作人留下难忘的印象。<sup>156</sup>后来，他这样回忆说：

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公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學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私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学生，便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眼泪，她眼看着她孙儿那样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sup>157</sup>

周作人第一次面对反动军警与爱国学生，反革命势力与群众的对立。他置身与普遍群众中见——在平时，周作人是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距离的，而此时，他却不能不为周围群众的情绪——对于反动军警的抗争，对爱国学生的同情所感染，甚至那擦眼泪的老太婆的辛酸，也引起了周作人的共鸣。当晚，他即写下了《偶成》，

---

<sup>156</sup> 参阅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页219-220。

<sup>15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每周评论下》，《知堂回想录》（下），页434-435。

对在六三运动中被捕的学生表示“敬意”。意犹未尽，又写诗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表示向往。<sup>158</sup>同年6月5日，周作人又目睹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马队冲击无辜的百姓，这毕竟太残酷，太无耻了。于是当晚立即写了一篇《前门遇马队记》来表示抗议与嘲讽。后来，李大钊告诉他：警察所曾派人到编辑处查问这篇文章。周作人听了也不感到有什么压力，他想起文章中最后一句话：“可是我绝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sup>159</sup>。<sup>160</sup>周作人在亲身经历“六三”风暴后，对于抨击迂腐专制的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更是坚定起来。

1919年7月2日，在五四风暴基本平息以后，周作人又从塘沽去东京，并于8月4日携同妻子儿女回国。周作人在日期间，最大的收获自然是他在7月7日至7月11日期间，对日本“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得访问。所谓“新村”，是1918年由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日向建立的，这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sup>161</sup>周作人在《日本的新村》一文里说：“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sup>162</sup>周作人在留日期间，就深为共产无政府主义所吸引，这次得以亲身经历新村里自然、超越利害、“人”的理想生活。这是周作人一直追求的人生境界，在现实中越无实现的可能，追求越是迫切。现在，周作人在日本仿佛找到了体现他理想原则的现实实验，总算有了自己

---

<sup>158</sup> 钱理群：《周作人传》，页221。

<sup>15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前门遇马队记〉，《谈虎集》，页11。

<sup>160</sup> 钱理群：《周作人传》，页222。

<sup>161</sup> 钱理群：《周作人传》，页223-225。

<sup>162</sup> 钱理群：〈日本的新村〉，《艺术与生活》，页201。

的“乌托邦”。于是，他从东京回国后，就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以至热情地写下了许多报告与文章。诸如《访日本新村记》、《新村运动的解说——对胡适先生的演说》等等。<sup>163</sup>周作人宣布的“新村的理想”即“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理想”与他这一时期所鼓吹的“人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却带有更加鲜明的空想主义色彩。然而，周作人所倡导的“新村运动”却遭受了其大哥的冷遇与质问：“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sup>164</sup>鲁迅不满意与周作人们对于乌托邦理想的过分沉溺，他主张立足于现实和更切实的战斗。周作人“新村运动”另一个有力的反对者是胡适，他指出周作人所鼓吹的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善其身”的“独善的个人主义”，“想跳出这个社会区寻找一种超出社会的理想生活”，“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sup>165</sup>周作人“人”的理想生活因为太过不切实际而终究告吹。“新村”虽说是乌托邦的理想，但代表了周作人实现自我的追求，更显示出他为实现个体与社会相和谐而做出的努力。<sup>166</sup>

1922年1月22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开辟了一个专栏，题曰“自己的园地”。这是周作人1921年1月至9月大病一场之后，第一个重要的举动。<sup>167</sup>周作人在病得很严重时，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一点点的流失，一点点的慢慢离开自己，他把这种敏锐的感觉写成一首诗，题曰《过去的生命》：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我亲自  
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

<sup>163</sup> 钱理群：《周作人传》，页229-230。

<sup>164</sup> 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页465。

<sup>165</sup> 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传》，页233-234。

<sup>166</sup> [新加坡]徐舒虹：《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16。

<sup>167</sup> 钱理群：《周作人传》，页247-248。

在纸上乱点，/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是一行也不能写，/一行也不能写。/我仍是睡在床上，/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sup>168</sup>

经过这场人生浩劫，周作人开始反思此前和大伙儿所做的一切文学革命是否真的有意义？他开始彷徨起来，于是想为自己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就是“自己的园地”。在“自己的园地”里，周作人坚持“独立的艺术美和无形的功利”，“依了自己的心得倾向”，去种“自己的园地”。他以为，“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办法”，相反“倘若用了什么大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sup>169</sup>因此，他要求思想和文艺上的宽容——“当自己求自由发展时，对于压迫的势力，不应去忍受的态度；当自己成了已成势力之后，对于他人的自由发展，不可不去宽容的态度”。<sup>170</sup>这里，周作人渴望着做回自己，肯定自己，同时也承认别人的存在，给予自己与别人自由，反对思想统一。这乃是和“人的文学”的主张相符合。然而，“中国对要求个人自由的呼声不曾重视过，它总是被淹没在‘民族独立与社会平等’的呼声中”。<sup>171</sup>周作人因而渴望被理解与接收，他在《自己的园地·序》里说道：“我自己知道这些文章都有点拙劣生硬，但是还能说出我想说的话；我平常欢喜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是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

<sup>168</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过去的生命〉，《知堂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4。

<sup>169</sup> 参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自己的园地〉，《自己的园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6。

<sup>170</sup> 参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文艺上的宽容〉，《自己的园地》，页6。

<sup>171</sup> 钱理群：《周作人传》，页250。

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倘若没有，也就罢了。——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sup>172</sup>周作人在争取自由发展的路上感到了深深的寂寞，于是在文学上，也即“自己的园地”里寻求慰安。

1924年6月17日，《晨报副刊》138号《杂感》栏里一条消息透露了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军阀政府又开始“取缔新思想”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及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等书被公开查禁，在查禁书之外，警察局还要“定期灭书”，“焚书坑儒”的历史阴影再一次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sup>173</sup>这历史的重来不禁让周作人深感失望。一个月后，周作人写了一篇《问星处的预言》，里头说道：“取缔思想”的，不仅是当局“衮衮诸公为然，便是青年也是如此，但看那种严厉地对付泰戈尔的情形就可知道，倘若有实权在手，大约太翁纵不驱逐出境，《吉檀伽利》恐不免于没收禁止的罢！”，并直言“中国国民暂时要这样地昏愤糊涂下去”。<sup>174</sup>周作人甚至不无痛心地说：“重来”概念，来说明启蒙的对象根本不可能觉醒，“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像是“僵尸的再现”！<sup>175</sup>又如其《教训之无用》一文所言：

……希腊有过苏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中国有过孔老，他们都被尊为圣人，但是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地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的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

---

<sup>172</sup> 详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自己的园地旧序〉，《苦雨斋序跋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21-22。

<sup>173</sup> 钱理群：《周作人传》，页291。

<sup>174</sup> 钱理群：《周作人传》，页291-292。

<sup>175</sup> 详见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重来〉，《谈虎集》，页72。

怎的更是寂寞，……（但若）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摸索好梦，不免近于痴人……<sup>176</sup>

在另一篇题为《不讨好的思想革命》的文章里，他这样谈到了中国思想启蒙者的命运：

（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劝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sup>177</sup>

这是一个“启蒙救国”梦的破灭。周作人在“沉默的国民”面前，感到自己的无力。既然没有觉醒的希望，再多说也是徒劳，那就不必硬要充当英雄还是各走自己的路为好。于是，周作人摆脱外在责任，转而书写“自己”，把五四时期提出的“救出自己”的个人本位主义原则发挥到极端。周作人这一时期一再强调的所谓“蔷薇色的梦”的破灭，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正是意味着他与同年以至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的诀别。<sup>178</sup>“过去”与“未来”替代，如同晨曦之后是日落一样，都是“自然”的安排，一切人为的干预不仅多余，而且是愚蠢的。也许闲静地站在一旁，不介入，绝义务，只冷静关照，顺其自然，才是明智的选择。周作人于是转而书写“自己”。在这期间，周作人顿感人生乏味，毫无目标的生活让他觉得很踏实，于是，他开始寻味人间，又因耐不住孤寂而不时怀念其从前的自己，企图找回那个仿佛这些年

---

<sup>176</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教训之无用〉，《雨天的书》，页 113-114。

<sup>177</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不讨好的思想革命〉，《谈虎集》，页 93-93。

<sup>178</sup> 钱理群：《周作人传》，页 291。

已经失落了的自己。这就无意间导致其以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来从事小品散文创作。而 1930 年代的周作人，更是感到刻骨铭心的寂寞，于是往古书堆里找到了“故人”以聊以自慰，更是被里头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深深吸引，转身成了“文抄公”，继续以另类的方式唤醒人们对“人”的自觉。

通过对周作人人生经历的考察，周作人无论处在顺流还是逆流，他以“人的文学”为中心的思考依旧没有改变过。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不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活着。他的文化批判、小品散文创作、以及翻译事业终其一生没有中断过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人，对自己，对民族的关怀。这种对人，对自己，对民族未来的寻问不禁使他有意无意地以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来从事创作，而其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更是对其坚持此创作观有着极大的影响。

总结而言，通过对周作人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的考察，我们发现，周作人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无不受其知识背景的启发和人生经历的影响。通过对周作人知识背景的考察，我们发现，周作人从西洋的求知精神，日本的人情美，以及国文的非正宗的别择法里得到对“人”的重新发现并构成了周作人以表现“人”为主的思想基础，进而成为其看世界的准绳，于其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有着极大的启发。另一方面，通过对周作人人生经历的考察，我们发现，周作人无论处在顺流还是逆流，他以“人的文学”为中心的思考依旧没有改变过。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不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活着。他仍然没有放弃对人，对自己，对民族的关怀。这种对人，对自己，对民族未来的寻问不禁使他有意无意地以追求

“真实”的散文创作观来从事创作，而其复杂多变的人生经历更是对其坚持此创作观有着极大的影响。

## 结语

每位创作者都有不可不书写的命题，而这个命题永远都是作者自身的最深刻经历抑或最向往的彼岸。周作人终其一生所坚持的以“人的文学”为中心的对“人”存在本质的思考的创作命题是他一生中最为深刻的启发，也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对这个命题的思考源自于周作人知识背景的启发与人生经历的影响。当周作人将这个思考命题写进散文创作时，散文中所体现的“真实”乃是出于其对民族未来的关怀、出于真诚的自我直视，以及出于人生味的缺乏。

创作是一个经验累积、自我探索与反思的过程。周作人同时也在创作的过程中窥探自我、评价自我以达到自我定位与回归。周作人这种对人、对自己、对民族未来的关怀与寻问，表现在其创作实践时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同时也象征着他的终极关怀，以及对精神家园的追求，一种在现实的逃离中对自我定位与自我回归的渴望与向往。基于周作人对“人”存在本质的深入思考与揭示，就如他所言：“我相信必须个人对于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希腊哲人达勒思（Thales）的格言道，‘知道你自己’可以说是最好的教训。”<sup>179</sup>周作人通过对追求“真实”的散文创作观的秉持，所要探索的，就是对

---

<sup>179</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妇女运动与常识》，《艺术与生活》，页 262。

于自己的了解，因为他认为只有“知道你自己”，才得以肯定自己，才得以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人的生活，才得以进而肯定人生，肯定生活在你周围的人类。因此，他只想得体地活着，只想在这纷乱的现世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子，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尤其是处在一个如此复杂多变的时代。就其散文而言，无论是前期抑或是后期小品散文，无论所表现的是什么语言风格，所体现的皆是周作人对社会生活、对民族、对自己的真实揭露，皆是周作人的真体悟、真感情、真理性的发现，皆是真实的周作人。如其所言：“以前杂文中道德的色彩，我至今完全的是认，觉得这样是好的，以后还当尽年寿向这方面努力，虽然我这传统的根据却与世界的知识是并行的，我的说话永久不免在新的听了以为旧，在旧的听了以为新，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因为如此，我又感觉我的路更没有走错，盖那些人所想像的路大抵都是错的也……我写文章虽说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无不是真诚的，校读一过，觉得芜杂原不能免，可是对于中国却是多少总有益的吧。”<sup>180</sup>周作人散文对“真实”的追求，不仅是他对人、自己和民族的反思，更是其对人、自己和民族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其爱人爱自己爱民族的体现。

这就是周作人散文对“真实”追求的意义所在。无论是在创作上，抑或是人生观上，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很好的观照。

---

<sup>180</sup>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后记〉，《立春以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190。

## 参考书目

周作人著作：

1. 周作人著；陈子善选编：《知堂集外集·四九年以后》，长沙：岳麓书社，1988。
2. 周作人著；杨牧编：《周作人文选》（初版），台北市：洪范书店，1983。
3.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风雨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瓜豆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过去的工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过去的生命》，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看云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苦口甘口》，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9.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苦雨斋序跋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苦竹杂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立春以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书房一角》，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3.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谈虎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4.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谈龙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5.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夜读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6.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7.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艺术与生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8.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泽泻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9.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知堂回想录》（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0. 周作人 著；止庵校订：《知堂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1.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知堂乙酉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2. 周作人著；止庵校订：《自己的园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专书论著：

1. 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重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页 157。
3. 黄开发：《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 胡兰成：《乱世文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7。
5. 鲁迅：《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6. 鲁迅：《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7.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 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10. 孙郁，黄乔生：《回望周作人·资料索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11. [新加坡] 徐舒虹：《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2. 余三定：《文学概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3. 赵家璧主编；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台北市，业强出版社，1990。
14. 止庵：《周作人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15.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八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